

李劫人《死水微澜》中方言叙事的语言 游戏说研究



黄姝一, 冯智娇*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 本文以李劫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为研究对象, 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理论框架, 通过文献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 深入剖析小说中四川方言叙事的语言特点及其作用。文章从“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和“意义即使用”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方言作为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语言实践, 生动再现清末川西市井生活的风貌; 方言中的类义词群通过语义场的局部相似性, 共同勾勒出小说人物鲜明立体的形象; 方言词汇在具体语境中产生的特殊含义, 不仅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更深刻反映社会规则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起伏。本文通过对《死水微澜》中方言叙事的深入分析, 尝试揭示方言除了作为文化载体, 同时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成为地方文化重构社会规则的隐形工具, 为中国现代文学地方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 李劫人; 方言叙事; 语言游戏说; 《死水微澜》

DOI: 10.57237/j.cll.2026.01.002

Study on the “Language Game” of Dialect Narration in Li Jieren’s “Ripples in Stagnant Water”

Huang Shuyi, Feng Zhij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Li Jieren's novel "The Ripples in the Stagnant Water"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dopts Wittgenstein's "language-game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narrative functions of Sichuan dialect in the novel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lose reading methods. The discussion unfolds around the three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theory: dialect, as a form of linguistic practice embedded in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vividly reproduces the features of urban life in western Sichu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clusters of synonymous dialect terms, through the partial similarities within their semantic fields, collectively portray the distinct and multi-faceted images of the novel's characters; the contextualized connotations of dialect words not only drive the progression of the plot, but also deeply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characters' fates. By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 dialect narration in "The Ripples in the Stagnant Wat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veal that beyond serving as a carrier of local culture, dialect also functions as an invisible tool for shaping character personas and reconstructing social rules through local cultural logic, thereby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to the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劫人法国文学汉译与中国文学创作的共生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25XWW0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信作者: 冯智娇, zhijiaofeng@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26-03-20; 接受日期: 2026-04-10; 在线出版日期: 2026-04-13

<http://www.chlanglit.com>

research on regional narra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Li Jieren; *Dialect Narration*; Language-game Theory; The Ripples in the Stagnant Water

1 引言

《死水微澜》[1]是李劫人 1935 年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以清末时期四川天回镇的市井生活为背景,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死水微澜》不仅以“大河小说”架构将清末义和团运动的时代浪潮与邓幺姑等底层个体的命运紧密交织,更将川西地域文化深度植入叙事之中——从文殊院建筑到名小吃细节,从袍哥江湖规则到市井阶层心态,勾勒出鲜活可感的成都文化画卷。有学者认为小说中处处充满了与川西地域空间环境有关的“审美”和“话题”,能够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川西”这个独特的地域空间环境中的一切[2]。

一直以来,方言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当地丰富的历史、民俗等文化传统。已有研究指出:“在现代市井小说中,语言绝非简单的交流工具,它始终承载着超越交流功能的文化密码”[3]。李劫人在其作品中则大量运用了方言叙事手段。清末时期,市井民间、官府势力、西方宗教三方力量纠葛不断,四川作为袍哥文化的中心,“一些隐语黑话便常常经由秘密群体之外的一些民众的传播而自然地进入地域方言之中”[4]。方言顺势成为市井阶层突破封建统治,建立民间话语体系的有力武器。《死水微澜》里遍布的四川方言并不只是地域标识,它精准还原了清末川西的社会生态,并通过袍哥黑话与市井俚语塑造人物,使读者得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彼时川西社会的烟火气与江湖气。同时,在作品文本层面,方言土语结合叙事节奏推动实现了对“死水”系统的慢性解构[3]。这种将方言深度嵌入叙事的方式,不仅较为完整地保留清末四川方言的表达特征,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地方叙事提供了重要范本。

尽管学界已注意到《死水微澜》的方言价值,但现有研究多停留于“文化载体”的表层描述,如李直飞[5]在 2011 年表示方言词语的运用带着浓郁的四川地域特色,以“摆龙门阵”探讨巴蜀文化;余婉馨[6]于 2022 年在《<死水微澜>在天回镇>巴蜀方言误译》中关注方言翻译对文化传播的影响;张金[7]于 2022 年在《试论<死水微澜>的语言审美内涵》里强调方言运用带来的文化美。基于此,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为工具,从“生活形式”、

“家族相似性”、“意义及使用”三个维度,解析《死水微澜》中方言叙事的特点,尝试揭示方言除了作为文化载体,同时如何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帮助地方文化重构社会规则的隐形工具。

2 用语言游戏说分析《死水微澜》的可行性

语言游戏说是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点,他在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8]中表示:“我也会把那个由语言以及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为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9]”,引导我们关注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这都可以体现在语言游戏说的一些核心特征上。

第一,“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多次表述“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9]、“说出某种语言是某种活动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9],这也就是表示语言游戏的存在基于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实践等。语言游戏不是悬浮的符号系统,而是深深嵌入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和互动行为之中的。《死水微澜》中的方言叙事,恰恰是这种“生活形式”的文学范本。在天回镇这个封闭空间里,赶场、吃茶、骂架、调情、袍哥的暗语接头、教民的洋腔洋调,所有这些语言活动都紧密编织在川西社会的肌理里。我们运用语言游戏说来观察,就能发现小说中的每一句方言都不是孤立的语汇,而是那个特定生活世界的切片。

第二,“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顾名思义就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虽然没有完全相同的脸孔,却在眉眼、神态或气质上存在相似的亲缘特征。维特根斯坦在书中移用这个特点描述“‘游戏’形成了一个家族”[9]。而有学者进一步补充,“语言上的家族相似性,就是各种语言现象之间基于各种不同的方式体现出一种亲缘关系。由于存在这种亲缘关系,语言才形成一个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语义网络。整个语言系统通过 A 相似于 B, B 相似于 C, C 相似于 D……这种链式关系形成一个庞大的语义概念关系网络。”[10]笔者认为,书中方言词汇的家

族相似性恰好可以用来解释李劫人如何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小说中那些形容人物的类义词群，正是通过局部的相似性互相照亮，共同勾勒出《死水微澜》中代表人物鲜明立体的形象。

第三，“意义即使用”。《哲学研究》中提到“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9]。具体来说“‘意义即使用’观向人们传递的信息在于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语言从其用法中抽离出来思考”[11]。这表明一个词的意义就是这个词在语言中的用法，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被使用的。在《死水微澜》中，袍哥黑话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当袍哥成员说出那些江湖暗语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说话，更是在执行袍哥的身份、维系地下社会的权力网络。这些话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动，其意义完全由特定的游戏规则决定，脱离了袍哥组织，那些词语就失去了效力。正如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思想，词语的意义不在于它指向什么，而在于它在具体游戏中如何使用。

因此，笔者认为用“语言游戏说”来分析《死水微澜》

中的方言叙事是具有可行性的。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李劫人《死水微澜》的方言叙述分析并置，是一次跨越哲学与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对话，语言游戏这一框架不仅能为解读小说的方言叙事提供分析工具，更能从哲学高度阐明其文化价值。

3 《死水微澜》中的“生活形式”——方言筑基，生活塑义

“生活形式”指出了语言实践与特定社会情境的不可分割。在《死水微澜》中，四川方言并非简单、抽象的语言符号，而是被嵌入具体社会场景的实践行为。这种带有“生活形式”的用语情况在书中所刻画的袍哥组织中时常可见。笔者参考《四川方言词典》，基于袍哥组织独特的组织架构、形式规则和社交模式整理出《死水微澜》中的部分相关方言词汇，如下表所示。

表 1 袍哥组织中的部分方言

章节	具体内容	方言
第三章	“有力量的，还须要通皮，还须要有点势力，那才能把我们保护得住，安稳过下去”[1]	“通皮”
第四章	“若是说到钱，经手的也有万把两银子，但是都烩和了”[1]	“烩和”
第三章	“余大爷当了五十四年的舵把子，声光及于全省”[1]	“舵把子”
第二章	“你是有身家的生意人，不比我这个跑滩匠，你应该讨个老婆，把姑夫的香烟承继起来”[1]	“跑滩匠”
第五章	“我还没告诉你，我眼前正在打流，等你做了官，我才能回去”[1]	“打流”

上文提到的四川方言：“通皮”、“烩和”、“舵把子”、“跑滩匠”、“打流”都基于袍哥组织的生活形式。“通皮”里的“皮”是袍哥，指同袍哥、会门中的人有交往[12]，也就是通晓江湖规矩，和袍哥搞好关系。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视角来看，“通皮”这一语词的真正意义并不囿于字面，而在于其在特定生活形式，即袍哥组织社交规则与生存逻辑中的实际运用。因为通皮，就能得到袍哥组织的庇护和照应。该方言依据并展现了袍哥组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生活信条。“烩和”指大吃大喝、胡乱花费[12]，描绘的是一种挥霍性的消费行为。袍哥成员的收入往往是偶然性、爆发式的，例如通过烫毛子、赌博或帮人办事，这种不稳定的谋生方式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形式，决定了他们的烩和式消费观念。烩和不仅仅是描述一种消费现象，更是袍哥们在这种经济生活模式下对金钱采取的特定态度和行为的表达。“舵把子”就是督把子，指哥老会码头的负责人[12]，也指袍哥组织的头领、掌舵人。该方言所依托的生活形式是袍

哥组织严密的权力等级结构，按照袍哥排位制权利层级系统，舵把子位于头排，是堂口的最高首领，拥有绝对权威，负责全面决策。在袍哥的生活形式中，称呼某人为舵把子蕴含着对其权威的承认与服从，这是在具体社会互动中确立等级、维系组织秩序的言语行为。“跑滩匠”指跑江湖或无固定工作地点、到处流浪的人[12]，该方言依托于带有江湖性质的袍哥组织生存形式，体现袍哥组织成员四处谋生的流动状态。“打流”与前面提到的跑滩意思相近，指生活无着，到处流荡谋生[12]，都基于袍哥组织流浪江湖谋生的日常生活状态。“打流”和“跑滩匠”都是该群体对其生成方式的自我描述与认同，二者在语言游戏中相互印证，编织出一幅关于漂泊、风险和江湖生存的语义图景，使这种特殊的袍哥生活形式在话语中被反复确认和固化。

除了袍哥组织的一套方言用语，小说中基于茶馆这一场景形式也有一套特殊的用语。笔者参考《四川方言词典》与《成都方言词典》整理出部分相关方言词汇，

如下表所示。

表 2 茶馆形式中的部分方言

章节	具体内容	方言
第二章	“你同她摆起龙门阵来，真真头头是道，咋样来，咋样去，讲得多好”[1]	“摆龙门阵”
第三章	“却不料余大爷竟像没有此事一样，每天依然一早就到华阳县门口常坐的茶馆中吃茶，偶尔也到场合上走走”[1]	“吃茶”
第五章	“并且在茶铺中谈话的人们，大抵都有点旁若无人，仿佛茶铺便是自己家里的密室一样的态度，任凭你说得如何地慷慨激昂，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你，这是一种习惯”[1]	“茶铺”
第五章	“他大气盆旋地叫幺师打水来洗脸。洗脸时，便向幺师查问一切”[1]	“幺师”

上文提到的四川方言：“摆龙门阵”、“吃茶”、“茶铺”、“幺师”都是基于清末川西市井的茶馆生活形式。“摆龙门阵”指讲故事、谈天[12]，它在茶铺这一特定生活形式中得到多次上演。摆龙门阵是茶铺生活的常态化表演，是信息流通、人情往来、社会评判的交汇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在构建着这一特定生活形式中的语言游戏规则。“吃茶”指喝用茶叶泡的饮料[13]，是茶铺生活的核心行为。同样的动作在北方叫“喝茶”，在江南叫“品茗”，这不是偶然的方言差异，而是生活形式在语言中的沉淀。“吃”字赋予茶以物质性，茶不仅是饮品，更成为可食用的生活必需品。方言“茶铺”本身就是一个承载着特定生活形式的空间概念，该词指卖茶水的铺子，设有座位，供顾客喝茶[13]。在四川方言中对相关设施称作“茶铺”，不同于北方称之为“茶馆”、江南地区称之为“茶楼”。这是因为川西市井的茶铺有着独特的公共社交空间，空间布局更加开阔，更适合百姓开放性聊天。“茶铺”体现了地域命名差异背后的不同生活形式。“幺师”指服务员的旧称[12]，是旧时对茶铺服务人员及厨师的称呼。“幺”有“最小”之意，“师”又带有对其技艺的尊重之情，这基于并展现幺师作为茶铺里的隐形管理者的身份，维护着茶铺的基本秩序。上述提到的四个词并非孤立的方言词汇，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游戏体系：在川西市井的茶馆这一特定生活形式中，茶铺是舞台，吃茶是入场，摆龙门阵是表演，幺师是调度，编织着热气腾腾的川西日常。

袍哥组织以独特的方言暗号为媒介进行交流，构筑了一个具备高度内部认同的江湖共同体，茶馆在川西市井中成为信息交换与舆论形成的重要场所。在不同的典型场景中，方言的语义受物质环境、社会关系、历史传统、权力运作等因素所影响。正如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观点，这些语言共同在《死水微澜》的故事里形成了基于一定生活形式的方言文化圈。

4 《死水微澜》中的“家族相似性”——方言类义，形象刻画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列举并分析了称之为“游戏”的活动：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角力游戏等，得出想法“我们看到了一张由彼此交叉重叠的相似之处构成的复杂网络。那大大小小的相似性。”[9]在后面的论述中维特根斯坦借助“家族相似”一词来刻画这些相似性。根据“类义词群内部成员在语义上表现为概念范畴的‘家族相似性’”这一特点[14]，笔者将以家族相似性为工具，探讨《死水微澜》的方言类义词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的作用。

邓幺姑作为《死水微澜》中所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在故事的开头被以大量笔墨刻画外貌的美丽，其中两个极具代表性的方言词汇“苏气”和“伸抖”同属于一个类义词群。

表 3 刻画邓幺姑的部分方言词

章节	具体内容	方言
第二章	“并比起来，自然她就苏气多了”[1]	“苏气”
第二章	“虽是长得伸抖一点，也是各人的福气”[1]	“伸抖”

首先，从概念上看，“苏气”形容外在的漂亮、好看[12]，“伸抖”也指人长得漂亮[13]。在川西坝子的评价体系里，“苏气”与“伸抖”共享一个模糊但明确的中心——“符合社会规范的出众形象”。这种相似性如同家族成

员的眼睛或身材，虽不完全相同，但在“漂亮”这一基因下达成了逻辑共识。其次，两个词在描述邓幺姑时存在交叉关系。“苏气”在《死水微澜》中是以邓幺姑和呆板的乡下新娘子作对比时得出的，侧重时髦、洋气、灵动，

是动态的审美倾向。而“伸抖”是在罗歪嘴先想到耍子、小旦等人物后再对邓幺姑所进行的评价，侧重“端正、清楚、整洁”，是静态的规整传统。两者在描述邓幺姑时产生交叉：一个“苏气”的人也需要“伸抖”的框架来支撑；同时一个“伸抖”的人通过“苏气”的修饰能更显生命力。这种相互纠缠、彼此定义的关系，正体现家族相似性中的“彼此交叉重叠的相似之处”。再次，从对邓幺姑形象塑造的深层意义来看，方言词的使用打破了单一标签。若仅用“漂亮”形容邓幺姑，形象就将流于扁平。通过“苏气”与“伸抖”的类义聚合，李劫人让邓幺姑的美丽形象更加立体。传统的乡村女性刻板印象多是吃苦耐劳、安于现状，被打上没见识的符号，而“身世略显复杂的邓幺姑有着不同于其他朴实无华的乡村少女的野心、欲望和追求”[15]。整体上看，“苏气”不但体现邓幺姑能与人侃侃而谈、与乡亲邻里打好交道的灵气，而

且反映近代成都商业文化对乡村的渗透，如洋货的流行、新式审美的传播，暗示邓幺姑对成都都市文化的认同。“伸抖”保留了传统农耕社会对女性端庄持重的要求，体现罗歪嘴等众人对邓幺姑守礼的最初印象，在与后续情节及人物行为进行对比后，更突出邓幺姑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觉醒。她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也打破规矩勇敢追求爱情，而在家庭危急时刻也不会束手束脚，为了保全自己和亲人去选择嫁给顾天成，“将自己从‘父权制’传统家庭结构中抽离出来，担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16]。

“土气”是顾天成洗不掉的一个形象特点，《死水微澜》中用“土苕”、“红苕气”和“迟眉钝眼”这三个方言词汇不断加深顾天成土气的形象。它们也同属于一个类义词群。

表 4 刻画顾天成的部分方言词

章节	具体内容	方言
第六章	“举动才那样地直率粗鲁，气象才那样地土苕”[1]	“土苕”
第三章	“但终于洗不脱周身土气，也就是成都人所挖苦的红苕气”〔1〕	“红苕气”
第六章	“并且迟眉钝眼地，看人憨痴痴的”[1]	“迟眉钝眼”

“土苕”形容土里土气[12]、“红苕气”表示像甘薯干儿一样的土气[12]、“迟眉钝眼”指神情呆滞，土傻[12]。“土苕”更有阶层乡土浸染的意味，“红苕气”更偏向气质的笨拙土气，“迟眉钝眼”体现生理和神态的滞后、不灵动，三者互有相似，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土气”这一基因下达成了逻辑共识，展现维特根斯坦所言的“交叉重叠的相似之处”，构成家族相似性。上述方言类义词群的使用能够让顾天成作为土粮户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他老实憨憨、朴实无华，与土地紧密相连。当顾天成带着“红苕气”进入天回镇时，周身的气质让罗歪嘴一行人认定他的软弱可欺，从而进行了对于他的设局加害。因为“迟眉钝眼”，前期顾天成在与罗歪嘴等机敏人物的较量中总是慢半拍、始终处于下风。在最后，顾天成虽拥有权势仍被邓幺姑认为“土苕”，也能体现他土气愚昧的根深蒂固。这些都为后续他根本没有清楚认识到洋教，却为复仇而愚笨地投靠洋教势力埋下了伏笔。可以看出方言词汇的描绘让人物动向更加合理、情节更为流畅。

《死水微澜》中，“苏气”、“伸抖”以家族相似性赋予邓幺姑兼具传统与新思想的立体形象，凸显其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觉醒；“土苕”、“红苕气”、“迟眉钝眼”以交叉重叠的相似性从多维度将顾天成土粮户的形象

刻画得栩栩如生，既揭示其老实憨厚却可欺的底层处境，又暗示其因土气愚昧投靠洋教的性格悲剧。两组类义词群都展现了方言词汇在文学形象塑造中的独特张力。

5 《死水微澜》中的“意义即使用”——使用显义，规则促变

李劫人在《死水微澜》中运用方言叙事手段来推进情节的发展，而方言在具体情境中所展现出的意义对故事关键节点又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有力体现方言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载体，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规则的参与者。

四川方言“做过场”有三个意义：一是指并不真心做某事，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而虚应故事；二是指故意做作，让人为难；三是指小孩哭闹、赌气、闹别扭[12]。李劫人在书中第二章写道“我早跟你说过，要零卖就正大光明地零卖，不要跟老子做这些过场”[1]。这句话是罗歪嘴对刘三金试探他真实想法、逼他表态的提醒，这里的“过场”便是第二个意义，指故意作难。该词一被说出，原本暗流涌动的试探就被挑明，罗歪嘴与刘三金的关

系就被最终定义为买卖关系,不再掺杂感情。书中第三章写道“比如才稍稍得了她一点甜头,在罗歪嘴等老手看来,不过是应有的过场”[1]。这句话是罗歪嘴在设计顾天成输钱前与其交谈时的内心想法,这里的“过场”是第一个意义,指不以真心付出的随意形式,这里也能体现出罗歪嘴对顾天成的不屑之情。而罗歪嘴伙同刘三金诈骗顾天成的行为也直接导致顾天成的复仇行为,引发官差抓人。“做过场”在《死水微澜》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中体现出人际关系的表演,描绘了一种动态的社会互动——人们通过这套表演来试探底线、发泄不满获取利益,他们能在不直接挑战权威或撕破脸皮的情况下,为自己腾挪出利益空间。顾天成正是在罗歪嘴与刘三金合演的“过场”中,被不动声色地算计,最终家破人亡。因此,“做过场”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互动用语,它润滑着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也掩盖着暗涌的利欲与冲突,最终编织成《死水微澜》中那潭看似死水、实则微澜不断的人际关系图景。

在大多数自然情况下,“水涨”单纯指水体的水位上升现象。在《死水微澜》中,该方言出现在第五章“只见罗歪嘴脸无人色地奔了进来,从后面抓住她的两个肩头,嘶声说道:‘我的心肝!外面水涨了!’”[1]袍哥文化的社会规则下,“水涨”出现了新的意义,指被官兵包围,风声紧急、危险临头[12]。说话人罗歪嘴是袍哥组织的头目,他的身份决定“水涨”不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是对险情的判断。该词在罗歪嘴口中天然携带了袍哥江湖的规则密码,因其特殊的意义重构了当下场景的身份权力关系,承载了罗歪嘴对江湖规则的恐惧、罗歪嘴与邓幺姑关系的突变和整个天回镇命运的转折。上面引用句中罗歪嘴的反应动作“脸无人色”、“奔”、“抓”都表现出“水涨”不仅是一个信息,更是他恐惧情绪的瞬间宣泄,包含他对即将到来的抓捕的预判和对自己处境的绝望。在事发之前,罗歪嘴是掌控局面的袍哥舵把子,在天回镇呼风唤雨,邓幺姑虽与他有情,但始终处于被动依附的位置。但当“水涨”二字从他口中嘶喊而出,曾经不可一世的罗歪嘴瞬间褪去光环,他抓住邓幺姑肩头的动作也不再是情人的亲昵而是溺水者抓住浮木的本能。曾经的保护者变成需要被庇护的逃犯,曾经的情人关系中夹杂起生死托付。同时它预示着邓幺姑家庭破碎、将被毒打的命运。这一刻也隐含着罗歪嘴和顾天成的权力关系的转变——罗歪嘴变成阶下囚而顾天成因检举有功成为掌握权力的胜利者。

“烫毛子”在杀猪的场景下指用开水烫去猪身上的毛,这本身是杀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在《死水微澜》

中,该词在新旧势力碰撞的江湖规则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书中第三章写道:“因为口头不干净,说场景不硬铮,耍了手脚,烫了他的毛子”[1],“烫毛子”在这里则指骗生人或不明情况的人[12]。这个意思通常产生在赌博、交易等金钱流动的场景中,充满人物的狡黠与算计。当书中“烫毛子”事件发生后,这个词的意义反过来参与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它使顾天成的身份在后续发生三次重大转变。最开始,顾天成因愚笨和缺乏江湖经验,被罗歪嘴一行人设计赌博后输得精光,捐官银子都损失的同时还受到了刘三金的欺骗和一群人的殴打,顾天成便从“土粮户”变成“受害者”,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第二次转变是从“受害者”变成“复仇者”,在书中“烫毛子”事件发生后,顾天成的妻子病死、女儿招弟失踪、田产房屋被幺伯侵占,件件惨事让顾天成从原先好好的一个粮户变成可怜的一条光棍。他心中向罗歪嘴复仇的火焰越烧越旺,逐步成为一个彻底的复仇者。为了得到权势来更好复仇,顾天成选择信奉洋教。最终他成为大粮户并成功向官府检举罗歪嘴,致使罗歪嘴成为阶下囚。故事到这里,顾天成顺利从“复仇者”变成“新的权势者”。“烫毛子”就这样在《死水微澜》的世界里见证并推动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同时成为新旧势力碰撞下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生动注脚。

从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死水微澜》中方言词汇的出现绝非仅为还原地域色彩,而是通过词汇在特定语境中特殊含义的运用,让方言参与故事情节的推动与社会规则的书写。《死水微澜》中的方言词如“做过场”、“水涨”、“烫毛子”等,既是人物在既定社会格局中进行利益博弈的工具,也是旧时代江湖规则与新旧冲突的语言印记。

6 结语

本文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理论框架,对李劫人的经典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的方言叙事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在“生活形式”这一维度上,方言词汇嵌入具体的社会场景之中,成为描绘特定生活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袍哥组织的黑话以及茶馆这一社交场所中的独特用语,均真实地再现清末川西地区市井生活的独特风貌;在“家族相似性”这一维度上,方言中的类义词群通过它们之间的局部相似性相互映照、彼此补充,共同勾勒出小说中人物鲜明而立体的形象,例如“苏气”与“伸抖”这两个方言词汇的运用,生动刻画

了邓幺姑兼具传统美与新思想意识的复杂形象，而“土苕”、“红苕气”和“迟眉钝眼”等词汇则将顾天成这一土粮户的形象强调得深入人心；在“意义即使用”这一维度上，方言词汇在小说所构建的具体语境中展现出的特殊含义，不仅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更深刻揭示社会规则的变迁以及人物命运的起伏，例如“做过场”、“水涨”和“烫毛子”等方言词汇在特定情境中的巧妙使用，生动揭示小说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

方言的运用使小说跳出了标准化语言的桎梏，以最贴近生活原貌的语汇还原了真实可感的历史，让读者得以触摸到清末川西社会的肌理与脉落。方言叙事中所承载的文化记忆、社会规则与民间智慧，不仅为《死水微澜》注入鲜活的生命力，更使其成为中国文学中地域书写的典范之作。现代化浪潮下，方言面临前所未有的消逝危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成为保存方言与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应珍视方言这一宝贵文学资源以传承地域文化、丰富文学表现、推动中国文学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劫人. 死水微澜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2] 万征. 李劫人笔下的川西乡土空间研究——以《死水微澜》中的五个典型空间为例 [J]. 当代文坛, 2013(03): 110-113.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13.03.025>
- [3] 谢柠果. 三重博弈: 论《死水微澜》中空间、权力与语言的突围叙事 [J]. 中原文学, 2025(11): 40-42.
- [4] 郝志伦. 四川地区袍哥隐语通用化传承初探 [J]. 中华文化论坛, 2013(03): 91-95. <https://doi.org/10.14092/j.cnki.cn11-3956/c.2020.01.014>
- [5] 李直飞. 龙门阵里面的“死水微澜”——《死水微澜》中龙门阵文化的探析 [J]. 当代文坛, 2011(S1): 58-61. <https://doi.org/10.19290/j.cnki.51-1076/i.2011.s1.014>
- [6] 余婉馨. 《死水微澜》在天回镇》巴蜀方言误译研究 [J]. 海外英语, 2022(14): 27-29.
- [7] 张金. 试论《死水微澜》的语言审美内涵 [J]. 美与时代(下), 2022(03): 111-116. <https://doi.org/10.16129/j.cnki.mysdx.2022.03.024>
- [8]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M]. Oxford: Blackwell, 1953.
- [9]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译. 楼巍.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10] 冯晓霞. 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J]. 文化学刊, 2023(04): 197-200.
- [11] 胡雯. 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观看《哲学研究》中的确定性思想 [J]. 外语学刊, 2017(04): 24-28. <https://doi.org/10.16263/j.cnki.23-1071/h.2017.04.005>
- [12] 王文虎, 张一舟, 周家筠. 四川方言词典 [C].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 [13] 梁德曼, 黄尚军. 成都方言词典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C].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4] 杨绪明. 类义词群的语义、形式关联及语用特征——兼谈类义关系研究的词汇学价值 [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3(01): 74-80. <https://doi.org/10.16088/j.issn.1001-6597.2017.01.013>
- [15] 李彦凤, 陈润莲. 需求层次视角下《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形象 [J]. 文学教育(上), 2023(05): 10-13. <https://doi.org/10.16692/j.cnki.wxjys.2023.05.038>
- [16] 华芸皓. 论《死水微澜》中蜀地女性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转变 [J]. 今古文创, 2025(44): 13-15. <https://doi.org/10.20024/j.cnki.CN42-1911/I.2025.44.004>